政治科學論叢／第 102 期／民國 113 年 12 月／頁 85-126

日本自民黨總裁初選的實施與挫折：1977 年至 1989 年*

吳明上**

摘　要

一般對政治的觀察，會將焦點集中在政治領導者。日本是採用內閣制度的國家，首相是政治上的最高領導者，而且往往由自民黨總裁擔任。因此，自民黨總裁選舉是觀察日本政治的焦點。

1960 年代開始，民主國家的政黨紛紛賦予黨員參與選舉政黨領袖的權力。自民黨於 1977 年在總裁選舉制度中，訂定了初選制度，除了國會議員外，黨員也能夠參與總裁選舉。自民黨做爲民主國家日本的政黨，爲何於 1977 年才制訂總裁初選制度？又爲何僅實施二次就遭到修改？以往對於總裁選出的研究，大致將焦點置於派閥之間的競合關係，本文擬就總裁選舉制度的新角度，解釋總裁的選出與自民黨政治的變化。

本文研究發現，自民黨制訂初選制度的原因，主要是自民黨因爆發金錢醜聞，導致政權出現重大危機，因此藉由賦予黨員選舉總裁的權力，塑造自民黨開放性的形象，挽回失去的民意支持度。但在政治家個人政治利益的算計下，初選反而成爲派閥擴張勢力的機制，導致僅實施二次便告終結，再度回到以派閥勢力爲主的選舉制度。

關鍵詞：自民黨總裁、初選、國會議員、派閥政治、政黨政治

---

* DOI:10.6166/TJPS.202412_(102).0003

**義守大學大眾傳播學系教授，E-mail: meizyou@isu.edu.tw。

收稿日期：113 年 4 月 26 日；通過日期：113 年 10 月 22 日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政治領導者是觀察政治運作的焦點。日本是採取內閣制的國家，首相是政治的最高領導者，掌握著國家機器與龐大的資源。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從 1955 年 11 月成立以來迄今（2024 年 11 月），雖然二度在野，但都在短期間之內取回首相寶座。自民黨總裁組閣執政的時間超過半個世紀；[1] 而且，在總計 28 任的總裁中，便有高達 26 任總裁身兼首相。[2] 因此，自民黨總裁是理解戰後日本政治的重要焦點。

自民黨從 1956 年 4 月的總裁選舉開始，[3] 概由黨籍國會議員與「都道府縣連支部連合會」（以下簡稱都道府縣連）的代表投票產生，直到 1977 年 4 月的黨大會，才在總裁選舉的架構中，制訂黨員能夠參與的「初選」（primary election，日文爲「預備選舉」）制度。[4] 1977 年修訂的「總裁公

---

1 自民黨於 1955 年 11 月 15 日成立時便是執政黨，自民黨成立迄今，二度失去政權。第一次是自民黨在 1993 年 7 月 18 日的眾議院選舉敗選，接著於同年 8 月 9 日下臺，由細川政權取代成爲執政黨，而在二年又五個月後，亦即 1996 年 1 月 11 日由橋本龍太郎再度取回首相寶座；第二次是自民黨於 2009 年 8 月 30 日的眾議院選舉敗選，接著於同年 9 月 16 日由民主黨的鳩山由紀夫政權取代執政，而在三年又三個月後，亦即 2012 年 12 月 26 日由安倍晉三取回首相寶座。自民黨總裁非擔任首相的時間僅爲五年又八個月。1994 年 6 月 3 日到 1996 年 1 月 11 日的村山富市內閣時期，自民黨是聯合政權的執政黨，但並未掌握首相寶座，因此，自民黨成立迄今，僅四年又七個月是在野黨。

2 自民黨歷任總裁中，未曾擔任過首相的是河野洋平與谷垣禎一。安倍晉三擔任過第 21 任與第 25 任等二任總裁。詳細而言，橋本龍太郎於 1995 年 9 月 30 日當選總裁時，當時的首相是社會黨的村山富市，直到 1996 年 1 月 11 日才接任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9 月 26 日再度當選總裁時，當時的首相是民主黨的野田家彥，到 2012 年 12 月 26 日才因眾議院選舉勝選擔任首相。

3 自民黨於 1955 年 11 月 15 日由自由黨與日本民主黨合併而成，但是在成立當初，兩黨對於首任總裁人事各有堅持，在協商爲未果下，最後成立「總裁代理委員會」（自由黨的緒方竹虎、大野伴睦，日本民主黨的鳩山一郎、三木武吉等四名組成）代行總裁職務，並對總裁在下一屆黨大會選出一事達成共識。因此，首任總裁於自民黨成立後的 1956 年 4 月的黨大會選舉產生（選出初代總裁鳩山一郎）。

4 「初選」又稱爲黨內預備選舉，是政黨決定選舉提名人的過程。依照投票資格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舉行方式。例如，美國各州依照投票資格的不同，有許多的舉行方式：「封閉式初選」（只限黨員投票）、「半封閉初選」（允許無黨籍者、或某期限內登記爲黨員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選規則」是「二階段」的選舉制度，第一階段是總裁候選人資格選舉（黨員初選），第二階段是總裁決定選舉（國會議員決選）。然而，二階段的總裁選舉制度僅實施二次，便於 1989 年合而爲一，將黨員黨友的「初選」與國會議員的「決選」同時舉行（同日投開票），而非分別前後舉行，大大地消減了黨員初選的政治效果，同時在實施過程中，也對自民黨政治產生重大的影響。

誠如 Kittilson 與 Scarrow (2003: 59-80) 以及 Kenig (2008: 244) 指出，1960 年代開始，民主國家的政黨紛紛賦予黨員參與選舉政黨領袖的權力。然而，爲何自民黨於 1977 年才制訂總裁初選規則？又爲何初選制度僅實施二次便進行修改？初選制度的實施與變化對自民黨政治又有何影響？這些疑問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貳、以往的研究觀點與本文的問題意識

一、以往的研究觀點

以往對自民黨總裁選出的研究有二個面向：一是從派閥的競合關係來分析，二是論述總裁初選的政治效應。

首先，關於派閥的競合關係方面。論者或從個案討論，或透過歸納整理論述，主張自民黨總裁的產出主要來自於派閥的競合。關於前者方面，例如，小堺昭三指出，三木總裁在任時，受到多數勢力的非主流派（田中派、福田派、大平派、船田派、水田派、椎名派）的抵制，導致三木政權運作窒礙難行，最後辭去總裁職位，同時在非主流勢力的協調下，產出福田赳夫總裁（2008：195-354）。又例如，奧島貞雄分析 1989 年的總裁選舉情形指出，竹下派、安倍派、河本派等聯合的多數勢力支持的海部俊樹，結果以壓倒性的優勢打敗宮澤派、二階堂集團支持的林義郎與僅獲得少數政治家（例如平沼赳夫、園田博之、山中貞則）支持的石原愼太郎，順利

者投票）、「開放式初選」（不限黨籍均可投票）、「半開放式初選」（投票者投票前宣示參與某政黨的初選，通常是以領取初選票的方式作爲意思表示）等。自民黨總裁的初選是「封閉式初選」，只允許登記爲黨員黨友，而且繳交一定期間的黨費者投票。

臺灣人學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當選總裁（奧島貞雄，2006：153-160）。

關於後者方面，田中善一郎（1985：1-33；1986）、Cox & Rosenbluth (1996: 259-297)、Reed (1999: 177-193)、中北浩爾（2017a：47-50）、塩田潮（2018：126-262）、川上高治（2022：73-88）等均指出，自民黨雖然爲一個政黨，但其實是派閥的聯合體，自民黨中央對於黨籍國會議員的拘束力，不如派閥來的大。派閥首領爲了競逐掌握黨政巨大權力的總裁職位（總裁往往身兼首相），出現不同派閥之間的聯合與競爭的關係，建構出自民黨政治。伊藤光利（2006：7-40）甚至直接表示，「派閥政治」是自民黨政治的代名詞，派閥對自民黨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自民黨的派閥如何產生？又爲何具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大平正芳首相有句名言：「有三個人，便會成爲二派」（中北浩爾，2024）。政治家爲了獲取更大的政治利益，理想或政治利益相同或相近的政治家便會採取集體行動，自民黨派閥的形成也不例外。自民黨派閥的影響力則與選舉制度息息相關。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在自民黨研究的經典著作《自民黨政權》一書明確指出，中選舉區制度是賦予自民黨派閥巨大影響力的制度性因素（1986：53）。建林正彥（2004：198）與內山融（2010：1-18）進一步解釋，在中選舉區制度下，每一個選區應選名額爲 3～5 名，作爲執政黨的自民黨，爲了掌握過半數的席次，必須在每個選區都提名複數的候選人，而在提名候選人時，總裁需要派閥的協助。信田智人（1994：39-40）、Krauss & Pekkanen (2011: 100-127) 表示，派閥首領在選舉過程中，提供選舉資金、人脈與網絡資源，以及選舉情報等，幫助派閥候選人當選，以擴大自身派閥的勢力與影響力。誠如 Schattschneider 所指出的，候選人提名制度反映出黨內的權力關係，誰能掌握提名大權，誰就能夠君臨這個政黨（1942：64）。[5]

其次，關於總裁初選的政治效應方面。總裁初選的政治效應有三：一是擬似政權輪替，二是拉提效應，三是提升政黨知名度。

第一關於「擬似政權輪替」方面。富森叡兒（1977：144-149）、牧原

[5] 自民黨派閥的影響力在 1994 年政治改革，特別是眾議院選舉制度改革後，出現衰退的現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2011：38-64）形容自民黨的派閥爲「黨中黨」，各派閥分佈在政治光譜的不同位置，率領派閥的首領輪流執政，宛如其他民主國家的政黨輪流執政一般，是爲「擬似政權輪替」的現象。奧島貞雄（2006）寓意深長地指出，總裁爭奪戰實際上活化了自民黨政治與日本政治，歷屆自民黨總裁的更替形成日本政治「擬似政權輪替」的效果，有利於自民黨建立長期政權。一般在審視「派閥政治」的利弊之際，容易將派閥政治與利益誘導政治相連結，引導出金錢政治的弊端，然而奧島貞雄的見解則提供了正面的觀點。

第二，關於「拉動效應」（Pull Effect）方面。Gerber & Morton (1998: 303-324)、Burden (2004: 211-227)，以及 Brady (2007: 79-105) 等學者的分析，在觀察美國總統選舉的「初選」過程後都指出，民主黨與共和黨都透過「初選」來提名總統候選人，在具有競爭性的初選下，會拉開候選人在政治光譜上的距離，促使候選人在意識形態上採取比較極端的立場（Brady et al., 2007: 79-105）。

Sasada 接著指出，自民黨總裁「初選」的過程中，也出現與美國一樣的「拉動效應」，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自民黨基層黨員與其他公民而言，一般較具有民族主義的傾向。二是自民黨的有力支持團體具有右翼的色彩，例如軍恩聯盟（自民黨的第三大支持團體）、遺族會，以及神社協會等宗教團體，軍恩聯盟與遺族會的成員合計超過最大支持團體的「大樹」（特定郵局退休人員組成），[6] 這些利益團體是自民黨的穩定票源（2010：1-30）。

第三，關於提升政黨的知名度方面。Dalton、McAllister 和 Wattenberg 在觀察西歐國家的情形後指出，即使政黨認同在許多民主國家中出現衰退的現象，但是在選舉過程中，媒體卻越來越關注政黨的黨魁，而非一般的

[6] 特定郵局（日文：特定郵便局）是明治政府於 1871 年向全國推動郵局制度時，因財政困難，所以向地方仕紳或大地主徵求無償提供建築物或土地來處理郵政事務所設置的郵局，政府則提供某些便宜措施作爲回報，例如新局長任用之際，並非透過定期舉行的國家公務員考試，而是在現任局長退休前夕，透過特別訂定的「選考任用」制度來甄選新局長，事實上，新局長大多是由自民黨地方幹部協商推薦的人士。日本郵政民營化以前，全國 24,000 個郵局中，大約有四分之三爲「特定郵局」；郵政民營化之後，雖然特定郵局在制度上遭到廢除，但是實際上依然有約 19,000 間舊特定郵局維持著以往的網絡關係，迄今仍然是自民黨選舉時的重要選票來源。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候選人（Dalton et al., 2002: 19-42）。例如，Farrel 便指出，黨魁之間的電視辯論節目已經成爲競選活動的一部分（2002）。

McElwain & Umeda 在觀察自民黨總裁的選舉後指出，日本的場合與西歐並無二致，黨魁的初選有提高政黨知名度的效果。主要的原因是初選的舉行能夠吸引媒體的關注，而且候選人爲了勝選，也會盡力利用媒體爭取黨員的支持，政黨名稱常常披露在媒體，提升了政黨的知名度。而且，除了政黨的知名度外，自民黨總裁初選的舉行也有提高內閣支持度的效果（2011：173-193）。

二、本文的問題意識

上述對於總裁選舉的以往研究觀點，大多探討單一任的總裁選舉，而且將分析焦點置於派閥的多數工作，幾乎沒有觸及「初選」的可能影響，也缺乏系統性的研究。黨員黨友參與總裁選舉，是政黨民主化的重要進程，而且自民黨總裁往往擔任首相，因此自民黨總裁「初選制度」的研究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課題。自民黨總裁選舉制度中的「初選」從 1977 年制訂以來，經過幾次的變革，本文作爲系統性研究的起點，選擇 1977 年到 1989 年爲探討的對象。

一般而言，在分析政治決定過程時，制度與行爲者的影響力孰輕孰重，素有論爭。制度論者主張制度是行爲者的規範，而行爲者論者認爲政治的主宰者是行爲者，即使制度相同，不同的行爲者會帶來不同的制度效果。但是本文認爲制度與行爲者是一體二面，互相影響的關係，行爲者採取的行爲必須於法有據，而制度亦需行爲者的善加運用始能落實。

以往對於自民黨總裁選出的研究，主要是從「行爲者」，意即「派閥」（國會議員的集合體）的競合關係來解釋。確實，誠如以往的研究所指出的，「派閥」的競合關係具有決定總裁的影響力。但是，爲何派閥具有決定總裁的影響力？對此簡單樸素的問題，也能從制度面提出二個解釋：一是投票者的組成，二是推薦制度。

首先，關於投票者的組成方面。自民黨的「總裁公選規則」（日文：総裁公選規程）於 1955 年 11 月創立時便明文規定，總裁由國會議員與自民黨的都道府縣連支部聯合會（以下簡稱：都道府縣連）代表各 2 名選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62 年 1 月 18 日的第十屆黨大會，將都道府縣連代表的名額從 2 名刪減爲 1 名。不論都道府縣連代表的名額是 2 名或是 1 名，自民黨國會議員的人數遠多於都道府縣連的代表。其次，關於推薦制度方面。自民黨總裁公選制度原先是採用「互選制」，亦即在選票上書寫支持對象的名字。1971 年 1 月 21 日的第二十五屆黨大會將總裁公選方式，改爲「推薦制」，意即需要 10 名國會議員連署推薦，才能成爲總裁選舉的候選人，接著 1977 年 4 月 25 日的第三十三屆臨時大會將推薦人的人數增加爲 20 名，1981 年 6 月 4 日的兩院議員總會再將推薦人數增加爲 50 名。[7] 推薦人數的增加，不僅墊高參與總裁選舉的門檻，同時也增加了派閥的重要性。因此，從「總裁公選規則」的規定，能夠清楚地瞭解派閥在總裁選舉中的重要地位。

本文並非否定或質疑以往的觀點，而是嘗試著從制度面提出另一個有效的解釋，亦即從總裁初選的實施過程來說明自民黨政治的變化過程。

參、總裁初選制度的需求

根據自民黨「黨則」的規定，自民黨總裁的選出機制有二：一是第 6 條第 1 項規定的，總裁由另訂定之「總裁公選規則」公選產生。「總裁公選規則」第 3 條則規定，總裁由黨籍國會議員及都道府縣連代表選舉產生；[8] 二是第 6 條第 2 項規定的，總裁從缺時，原則上依照前項規定（總裁公選規則）公選總裁，但是特別緊急之際，得由兩院議員總會取代黨大會選出新總裁。

自民黨總裁的第一任（1956 年 4 月 5 日）到第六任（1972 年 7 月 5 日）都是依據「總裁公選規則」選出，而第七任（1975 年 1 月 22 日）與第八任（1977 年 1 月 26 日）則是由兩院議員總會選出。自民黨員被賦予選舉總裁的權力是從 1977 年 4 月 25 日的黨大會修訂「總裁公選規則」後開始的。自民黨在 1977 年的修訂中，制訂了「二階段」的總裁選舉制度：

---

[7] 關於推薦人數方面，1989 年 9 月 28 日的兩院議員總會將推薦人數降爲 30 名，2002 年 1 月 18 日的第六十八屆黨大會再降爲 20 名並維持至今。

[8] 依據「總裁公選規則」規定，都道府縣連代表原爲各 2 名，然而 1962 年 1 月黨大會刪減爲各 1 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一階段是黨員初選決定的「總裁候選人資格選舉」，第二階段是國會議員投票舉行的「總裁決定選舉」。

1960 年代開始，民主國家的政黨在選擇黨魁之際，賦予黨員更多的權力已經成爲民主國家的一種趨勢。爲何做爲民主國家日本的政黨「自民黨」於 1977 年才制訂黨員參與的總裁選舉制度？主要的原因是自民黨從 1955 年成立後，直到 1970 年代中期爲止，自民黨政權處於相對穩定的時期，1970 年代中期開始出現政權危機。

一、自民黨政權的穩定期

自民黨從 1955 年 11 月成立後便是執政黨，直到 1970 年代中期，不僅維持著單獨政權，而且政權的運作也相對穩定。自民黨政權的相對穩定，能從最大在野黨社會黨在眾議院選舉時，提名的候選人數目一窺究竟。

從「表 1」能夠明顯看出，社會黨在自民黨成立後的眾議院選舉中，僅於 1958 年的眾議院選舉時，提名 246 名候選人，站總席次 467 席的 52.7%，當選席次爲 166 席，遠落後於自民黨的 287 席，而從 1960 年到 1976 年的眾議院選舉中，社會黨的候選人數均未達 50%，即使全部當選，也無法擁有過半數席次，更遑論組閣執政。換言之，社會黨並無積極取得政權的企圖心。[9]

與此同時，自民黨與社會黨利用「國對政治」的模式，建構出自民黨「一黨優勢執政」（one-party dominant system）的模式。「國對政治」是朝野協商的舞臺，是議會政治的延長，也是執政黨穩定國會運作的重要機制。曾任自民黨幹事長的野中廣務指出，自民黨的金丸信與社會黨的田邊誠，或是自民黨的梶山靜六與社會黨的村山富市，都是著名的「國對政治」組合（野中広務，1996：124-127）。眾議院事務局出身的自民黨參議院議員平野貞夫進一步指出，[10]「國對政治」起源於片山哲政權時代（1947 年 5 月 24 日～

[9] 實際上，社會黨在整個「五五年體制」時期，除了 1958 年外，候選人數都未達 50%。與此同時，社會黨在眾議院的席次約爲自民黨的半數，因此「五五年體制」時期的政黨體制又被稱爲「一又二分之一政黨體制」。

[10] 平野貞夫於 1960 年日本法政大學社會科學碩士班畢業後，進入眾議院事務局任職，前後經歷副議長秘書、議長秘書、委員部總務課長、委員部長。1992 年 7 月，在自民黨、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1948 年 3 月 10 日），因爲片山政權是日本社會黨、民主黨與國民協同黨的聯合政權，執政聯盟必須針對提出的法案進行協商，所以發展出「國會對策」的模式。爾後被自民黨與社會黨在「五五年體制」期間轉用於朝野協商。就此脈絡而言，「五五年體制」是社會黨與自民黨透過「國對政治」建立起來的體制。自民黨於 1993 年 8 月下臺後，旋即於 1994 年 6 月與社會黨（以及先驅新黨）聯手建立聯合政權，當時輿論驚訝譁然，其實自民黨與社會黨在國會運作上的合作已經有了長久的歷史（吉田健一，2021：312-313）。

表 1　社會黨衆議院選舉候選人數一覽表（1958～1976）

衆議院選舉時間	候 選 人 數（A）	議 席 總 數（B）	候選人數佔比（A/B）
1958 年 05 月 22 日	246	467	52.7%
1960 年 11 月 20 日	186	467	39.8%
1963 年 11 月 21 日	198	467	42.4%
1967 年 01 月 29 日	209	486	43.0%
1969 年 12 月 27 日	183	486	37.7%
1972 年 12 月 10 日	161	491	32.8%
1976 年 12 月 05 日	162	511	31.7%

資料來源：依據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2017）的資料整理製表而成

二、自民黨政權的危機

(一) 金錢政治

自民黨政權相對穩定的狀況在田中政權時出現重大的轉變。田中角榮於 1972 年 6 月 17 日的總裁公選中，與福田赳夫展開激烈的「角福戰爭」。在第一輪投票結果，田中角榮獲得 156 票，微幅領先福田赳夫的 150 票，第三位的大平正芳獲得 101 票，第四位的三木武夫獲得 69 票，在總票數 476 票中，因爲沒有候選人超過半數，依照「總裁公選規則」的規定，由

公明黨、民社黨的推薦與支持下當選參議院議員，同時接受執政黨與在野黨的支持，是相當稀有的案例。平野貞夫在加入自民黨後，成爲小澤一郎的盟友，因其嫻熟國會運作事務，也被視爲小澤一郎的智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二高票者，亦即田中角榮與福田赳夫進行第二輪的決選。第二輪決選時，大平派轉而支持田中角榮，投票結果，田中角榮以 282 票大勝福田赳夫的 190 票。田中角榮於 7 月 7 日組閣執政，成爲當時戰後最年輕的首相（54 歲），田中內閣成立之初也創下 62% 的高度支持率（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2）。然而，三木武夫對總裁選舉期間，巨額資金橫流、黨政職位私相授受的情形感嘆地表示，總裁選舉是萬惡的根源（飯塚繁太郎，1986：97）。田中政權與金錢政治及派閥政治的密切關係浮上臺面。

田中剛上臺時，雖然內閣支持度高，但是不久之後，地價與物價雙雙飆升，內閣支持度逐漸下滑。1974 年 10 月暴露的金錢政治問題，更是直接導致田中辭職下臺。日本著名的月刊《文藝春秋》於 1974 年 10 月刊登了立花隆的〈田中角榮研究：其金脈與人脈〉（1974：92-131）與兒玉隆也的〈孤寂的越山會女王〉（1974：132-152）二篇文章，揭露了田中角榮的金脈問題與金錢政治的密切關係，以及秘書佐藤昭子操控的「越山會」事實上是田中金錢政治的金庫。田中內閣受到在野黨與輿論的極大壓力，內閣的支持度也急遽下墜，根據《朝日新聞》於 1974 年 12 月 8 日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田中內閣的支持度僅爲 22%，創下戰後最低紀錄，而不支持度爲 69%，則創下戰後最高紀錄（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4）。田中在巨大的壓力下辭去總裁職務，成爲自民黨第一位因金錢政治問題辭職的總裁。自民黨中央顧慮到輿論對自民黨的金錢政治的批判，因此決定不舉行總裁選舉，而是由椎名悅三郎副總裁以「裁定」的形式，指定由象形清廉的三木武夫爲總裁。

三木就任總裁後，提出全體黨員參與的總裁選舉制度以及政治資金透明化的改革政策，但是受到黨內非主流派與大企業的反對而成效不彰（田中善一郎，1981：369-378）。[11] 1976 年 2 月 4 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揭露了「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 Corporation）爲了向全日空出售三星

[11] 三木武夫就任總裁後，提出三大改革政策：一是修正政治資金管理辦法，更加嚴格管制企業的政治獻金，二是修正獨佔禁止法，促進獨佔企業的分割，三是導入總裁初選制度，防止總裁選舉的弊端。三木總裁的作爲牴觸了黨內多數勢力，特別是田中派、大平派、船田派、水田派、椎名派，以及大企業的政治利益，而遭到抵制，致使三木總裁的改革出現成效不彰的情形。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ristar）客機與次世代防潛巡邏機，而向日本政府高層行賄 26 億日幣的賄賂事件，引爆日本政壇。三木誓言追究事件的眞相，立即受到以田中派爲首的非主流派的反彈，並對三木開始採取「逼宮」行動。三木首相企圖解散眾議院重新選舉，以打開侷促的政治局面，但因受制於反主流派的阻撓而未果，直到 1976 年 12 月 5 日，眾議院議員任期屆滿才舉行總選舉。[12]

(二) 朝野伯仲

選舉結果，自民黨遭受到史無前例的挫敗。自民黨僅獲得 249 席，不及過半數的 256 席（總席次 511 席），是自民黨首度在眾議院選舉未過半的選舉。自民黨在 12 月 24 日第七十九屆臨時國會（首相指名選舉）前，才透過追加承認 11 名無黨籍保守派議員，勉強達到正好過半數的 256 席，自民黨在眾議院正式面臨了「伯仲國會」的現象。

所謂的「伯仲國會」是指，執政黨雖然擁有較多數的席次，但是卻未能掌握「安定多數」，[13] 因而失去主導委員會審議的主導權。日本的國會法案審議是採用「委員會中心主義」，執政黨若是能夠主導委員會的法案審議，則能確保法案順利獲得國會通過，進而穩定政權的運作。「安定多數」是指確保所有常設委員會擁有半數的席次，以及同時擁有所有委員會主席的席次。如果政策法案在常設委員會表決時出現正反同票時，主席擁有關鍵性的一票，因此能確保執政黨在審查法案的主導權。1976 年的眾議院總

[12] 雖然眾議院的解散權是首相的「專屬權力」，首相也能夠罷免反對解散的閣員，但是，三木首相企圖解散眾議院時，黨內的絕大多數勢力（包含田中派、福田派、大平派、船田派、水田派、椎名派）擔心恐因「落克希德事件」不利於自民黨的選舉，甚至將會失去政權，因此反對解散眾議院提前選舉。三木總裁在考量少數的主流派無法獲得眾議院過半數席次的現實下，不得不放棄行使眾議院的解散權。1976 年 12 月的總選舉也是戰後憲政體制下迄今，唯一的眾議院議員任期屆滿選舉。

[13] 日本的國會在審查法案時，有所謂的「安定多數」與「絕對安定多數」的門檻。「安定多數」是指確保所常設委員會的半數席次，而且擁有委員會主席的席次數目。「絕對安定多數」則是指確保所有常設委員會有過半數的席次，以及擁有常設委員會主席的席次。在達到「安定多數」的門檻下，若政策法案出現正反同票時，主席握有關鍵的一票，而「絕對安定多數」的場合，一般不需主席投票便能掌握政策的成立與否。1976 年的眾議院總席次是 511 席，「安定多數」是 271，「絕對安定多數」是 287。參議院的總席次是 250 席，「安定多數」是 136，「絕對安定多數」是 15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席次是 511 席，「安定多數」是 271（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6），自民黨僅有 256 席，距離「安定多數」尚遠。換言之，自民黨在眾議院再也無法掌握法案審議的主導權。

事實上，自民黨於 1974 年 7 月的參議院選舉後，在參議院已經面臨到「伯仲國會」的情形。自民黨在選舉後的總席次爲 126 席，正好過半數（總席次 250），距離「安定多數」的 136 尚有 10 席之遙。1974 年的參議院選舉後，雖然在參議院出現「伯仲國會」的情形，但是在眾議院優越的憲政體制下，[14] 自民黨在眾議院仍然保有優勢，[15] 政權運作尚能勉力而爲。但是 1976 年眾議院選舉後，眾議院也陷入「伯仲國會」的現象，眾參二院同時面臨「伯仲國會」的狀況，對自民黨政權的穩定形成嚴重的打擊。

除了「伯仲國會」的窘境外，新自由俱樂部的成立也撼動著自民黨政權。自民黨爆發「洛克希德事件」後，河野洋平、田川成一、西岡武夫、山口敏夫等改革派議員便脫離開自民黨，以「刷新保守政治」爲號召，於 1976 年 6 月 25 日成立新政黨，名爲「新自由俱樂部」（新自由クラブ）（河野洋平，1976：26-29）。新自由俱樂部成立不久，立即投入 1976 年 12 月的眾議院選舉，選舉結果獲得大勝利，席次從 5 席大幅加爲 17 席。自民黨成立後，長久以來保守政黨只有自民黨一個政黨，對左派革新政黨（社會黨）抱持疑慮，同時對自民黨政治不滿的選民而言，新保守政黨「新自由俱樂部」正好提供另一個（唯一的）選擇（堀江湛、城所洋子，1978：65-71）。「新自由俱樂部」的躍進，表現出選民對自民黨派閥政治與金錢政治的強烈不滿，假若置之不理，可能危及政權的存續。

---

[14] 依據《日本國憲法》的規定，相對於參議院，眾議院的優越地位表現於以下五點：第一是眾參二院對於首相指名選舉出現不同結果時，以眾議院之決議爲國會之決議（憲法第 67 條第 2 項）；第二是僅有眾議院擁有內閣不信任案或內閣信任案的表決權力（憲法第 69 條）；第三是眾議院對預算案擁有先議權外，若眾參二院出現不同決議時，以眾議院之決議爲國會之決議（憲法第 60 條）；第四是眾參二院對條案出現不同決議時，以眾議院之決議爲國會之決議（憲法第 61 條）；第五是眾院通過的法案遭參議院否決時，若眾議院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再度通過時，即成爲法案（憲法第 59 條）。

[15] 1972 年 12 月眾議院選舉後，自民黨獲得 271 席，加上追加承認無黨籍保守立場的議員席次後，總計 284 席，超過「安定多數」的席次。1972 年眾議院選舉時，總席次是 491 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肆、總裁初選制度的制訂與實施

一、總裁初選制度的制訂

三木首相於 1976 年 12 月 17 日因眾議院選舉挫敗引咎辭職時表示：現行總裁選舉是萬惡的根源，爲了黨的重生，務必進行「總裁公選制度」改革（藤本一美，2011：183）。三木首相辭職後，在大平正芳的禮讓下，福田赳夫成爲新總裁。[16] 福田赳夫於 1972 年的總裁選舉中，以些微差距敗給動用鉅額資金的田中角榮，福田組閣執政後，決意將以往由派閥與金錢決定的總裁選舉，以「開放性選舉」做爲改革的方向（宇治敏彥，2001：314）。

福田總裁遂於組閣執政的翌月，亦即 1977 年 1 月 21 日立即成立「黨改革實施本部」，福田總裁親自擔任本部長，研議「總裁公選規則」的修訂，二個月後的 3 月 21 日便完成改革草案，在經過 4 月 2 日的總務會審議後，提交 4 月 25 日第三十三屆臨時黨大會表決通過（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7b）。福田總裁在短短的 2 個月內便完成改革草案，足見黨內危機感之高（中北浩爾，2014：84-85）。

修訂後的「總裁公選規則」是採用二階段的選舉制度：第一階段是「總裁候選人資格選舉」，由黨員投票的初選產生。黨員須連續繳交二年黨費始能具有投票權，有意出馬角逐總裁寶座者，須獲得 20 名的國會議員的推薦始能參與初選。初選在都道府縣連舉行，依照黨員數給予不同的「點數」，每 1 千名黨員換算爲一點，都道府縣連將各自的「點數」依照黨員票的得票率分配給參選人，並向黨中央推薦前二高點數者。接著，黨中央進行全國性的「點數」統計，獲得最多點數的前二名參選人取得總裁候選人資格，進入第二階段的總裁決定選舉。第二階段的「總裁決定選舉」（決選）是由國會議員投票舉行，獲得較多票數者獲勝。因爲是自民黨首度大幅更改「總

[16] 三木總裁引咎辭職後，「三角大福」鬥爭構造中，僅剩大平正芳與福田赳夫。日本政壇盛傳一件密約，亦即大平正芳（1910 年生）先禮讓年長的福田赳夫（1905 年生）擔任總裁，同時爲了大平正芳能儘快擔任總裁，因此將總裁任期從三年縮短爲二年。因此，當福田致電大平表示要出馬競選時，引發大平的強烈不滿，揭開「大福決戰」的序幕（江口伸幸，1985：49）。（第二幕是「四十日抗爭」）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表 2 自民黨「總裁公選規則」中「初選制度」修訂情形（1977 年～1989 年）

修正時間與場域	主 要 修 訂 內 容
1977 年 4 月 25 日 第 33 屆臨時大會	總裁選舉的二個階段： 第一階段：總裁候選人決定選舉 1. 黨員投票（初選）產生總裁候選人。 2. 黨員連續二年繳納黨費者具有投票權。 3. 依照都道府縣連的黨員數給予不同的「點數」，黨員每一千名換算為一點，未滿一千名者無條件進位。 4. 全國都道府縣連同時舉行黨員投開票，將各自的「點數」依照黨員票的得票率分配給參選人，並向黨中央推薦前二高者。接著黨中央進行全國性統計，「點數」最高的前二位參選人進入總裁決選。 5. 黨員於投票日前往所屬都道府縣連設置的投票所投票。 6. 總裁候選人推薦人數為 20 名。 第二階段：總裁決定選舉 1. 國會議員進行總裁決定選舉。 2. 國會議員投票結果，票數較多者勝出。
1978 年 1 月 20 日 第 34 屆黨大會	總裁初選之投票權除黨員外，新增加「自由國民會議會員」與「國民政治協會個人會員」（連續二年繳納黨費及費會者）。
1980 年 1 月 23 日 第 37 屆黨大會	廢除「點數」與都道府縣的推薦制度，改以候選人的全國總裁初選得票數計算，最高票的前二位候選人進入總裁決定選舉。
1981 年 6 月 4 日 兩院議員總會 （1982 年 1 月 21 日 第 40 屆黨大會追認）	1. 總裁決定選舉的候選人由初選中排名前二名增加為前三名。 2. 參加初選的參選人在三名（含）以內時，原則上不舉行初選，自動成為總裁決定選舉的候選人。但，若有超過三分之二以上黨屬國會議員、自由國民會議議員、代議士之要求時，亦得以舉行初選。 3. 總裁決定選舉未有候選人超過有效票過半數時，獲得前二高票者進入最後的決選。 4. 初選以郵寄選票方式進行。 5. 黨員投票資格從黨費連續繳納二年延長為三年。
1989 年 9 月 28 日 兩院議員總會 （1989 年 10 月 31 日第 51 屆臨時黨大 會追認）	1. 廢除二階段投票制度，初選與決選同時舉行。 2. 都道府縣「持有票」：各都道府縣依照黨員黨友數賦予「持有票」，黨員黨友未滿二萬名者為一票，二萬到五萬名為二票，五萬到十萬名為三票，十萬名以上則為四票。各都道府縣黨員黨友票最高票者獲得該都道府縣所有的「持有票」。 3. 黨員黨友直接到所屬都道府縣投票所投票，與國會議員同日投開票。 4. 候選人為二名（含）以上時舉行總裁選舉，只有一名時不舉行選舉，逕行當選。 5. 候選人得票總數為都道府縣「持有票」與國會議員票的總和。

資料來源：根據自由民主黨（自由民主党編，2006：73-86）資料整理而成

裁公選規則」，不僅賦予黨員選舉總裁的權力，更將國會議員的投票置於黨員初選之後，凸顯出黨中央對基層民意的重視，對自民黨而言是史無前例的制度。福田首相在臨時黨大會致詞時便表示，總裁選舉制度的改革堪稱爲自民黨重新出發的改革（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7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著，自民黨於 1978 年 1 月 20 日的第三十四屆黨大會決議，除了黨員外，新賦予「自由國民會議會員」[17] 與「國民政治協會個人會員」[18]（連續 2 年繳納會費者）參與總裁選舉的權力，以利集結更廣大的自民黨支持層的基層民意（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8）。(「總裁公選規則」的修訂詳細內容請參閱表 2）

表 3　自民黨總裁選出一覽表（1978～1989 年）

選出時間	總裁姓名	選出機制	備註
1978 年 11 月	大平正芳	總裁公選	初選決定總裁人選
1980 年 07 月	鈴木善幸	兩院議員總會	西村英一副總裁裁定（無投票）
1980 年 11 月	鈴木善幸	臨時黨大會*	連任、無投票（候選人一名）
1982 年 11 月	中曾根康弘	總裁公選	初選決定總裁人選
1984 年 10 月	中曾根康弘	兩院議員總會	連任、無投票（候選人一名）
1986 年 09 月	中曾根康弘	兩院議員總會	任期延長一年
1987 年 10 月	竹下登	臨時黨大會**	中曾根總裁裁定（無投票）
1989 年 06 月	宇野宗佑	兩院議員總會	竹下總裁裁定（無投票）
1989 年 08 月	海部俊樹	兩院議員總會	國會議員、都道府縣連代表投票
1989 年 10 月	海部俊樹	臨時黨大會***	連任、無投票（候選人一名）
1991 年 10 月	宮澤喜一	總裁公選	國會議員選舉＋都道府縣連「持有票」

資料來源：根據自由民主黨（自由民主党編，2006：1893-1895）資料整理而成

備　註：* 候選人僅鈴木善幸一名，由總裁選舉管理委員會向大會議長報告，全場一致通過。

** 有宮澤喜一、安倍晉太郎、竹下登等三名候選人，協商結果由中曾根首相裁定，中曾根首相裁定竹下登為下任總裁，因此未舉行總裁選舉，而由總裁選舉管理委員會向大會議長報告，全體一致通過。

*** 候選人僅海部俊樹一名，由總裁選舉管理委員會向大會議長報告，全場一致通過。

---

[17] 自由國民會議（自由社会を守る国民会議）是自民黨友好的政治組織，成立於 1977 年 7 月，主要針對礙於立場難以成爲自民黨黨員的學者、文化界人士等而設立的政治團體，藉以擴大學術界與文化界對自民黨的支持。

[18] 國民政治協會是統籌自民黨政治獻金的一般財團法人。1961 年 1 月的池田勇人政權成立後，決意進行創黨以來的懸案「黨的近代化」，經手自民黨政治獻金的既有團體「經濟重建懇談會」與「自由國民聯合」的所屬財界人士與自民黨金錢掛勾，長久以來受到媒體與輿論的批評。因此，池田政權於 1961 年 7 月 15 日成立「國民協會」統籌自民黨的政治獻金，經過洛克希得事件與石油危機導致財界動搖下，三木武夫首相上臺後進行重整，1975 年 4 月 26 日改名爲「國民政治協會」，在「政治資金管制法」的修改下，成爲自民黨政治獻金的指定團體。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二、1978 年的總裁初選

福田首相於 1977 年 4 月修訂「總裁選舉規則」後，於同年 11 月 28 日進行內閣改組，並企圖透過解散眾議院重新改選，取得繼續執政的基礎。但是福田的作爲違反當初大平禮讓的約定，引發大平派，以及支持大平派的田中派的強烈反對。雖然如此，福田並未強行解散，因爲福田對初選具有高度的信心。除了內閣支持度逐漸回升外，福田也位居現任者優勢的戰略位置，而且大眾媒體也都看認爲現階段並無更換政權的必要性，而看好福田的勝選。福田認爲，如果依照以往的慣例，若由國會議員投票或派閥合作，則對受到田中派支持的大平有利，但是若由黨員初選，則自己應該會勝出（岩見隆夫，1986：218-220）。

自民黨總裁選舉管理委員會於 1978 年 11 月 1 日發布總裁選舉告示後，登記參選的有福田赳夫總裁、大平正芳幹事長、中曾根康弘總務會長、河本敏夫通產大臣等 4 位。11 月 27 日開票結果，大平正芳出乎意料地獲得 748 點位居第一，大勝福田赳夫的 638 點，中曾根獲得 93 點，河本敏夫則爲 46 點。福田赳夫在回顧錄表示：初選結果揭曉後，石原愼太郎、中川一郎等青壯派極力主張要在第二輪的「決選」扳回一成，但是我覺得政治家要信守承諾，在選舉中我曾說「初選若是有明確的勝敗，則必須遵從之」（1995：248-249）。因此福田辭退第二輪的決選，大平正芳成爲自民黨總裁。

爲何事先被看好的福田會落敗？主要的原因是田中派的支持。根據小堺昭三表示，總裁初選時，黨員名冊應該是秘密保管的，但是能夠調閱黨員名冊的「總裁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長竹下登（田中派）本應保持中立，卻將名冊洩漏給田中派與大平派，於是田中派與大平派依照名冊進行全國性、地毯式的選戰（2008：232-236）。田中角榮的秘書早坂茂三便以東京爲例指出，東京都是以後藤田正晴爲核心所展開的地毯式作戰行動，秘書以二名爲一組，挨家挨戶拜訪黨員爭取支持。而田中角榮則親自打電話給黨的幹部、地方議會、農協、漁協、工商團體等地方組織爭取支持。在日本的選舉中，家戶拜訪一般的選民是被禁止的，但若是後援會的成員則能夠規避限制，基本上自民黨的黨員都是某議員的後援會成員（1988：181-184）。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在田中角榮的大力支持下，大平正芳最終得以「逆轉勝」。福田赳夫自身也表示，因推動黨的近代化改革，初選時福田派（八日會）已經停止運作，因此總裁初選是敗給了田中派與大平派的組織動員與金錢（1995：249）。

三、四十日抗爭：分裂危機

大平雖然贏得總裁選舉，並獲得國會指名組閣執政，但依然面臨著「伯仲國會」的困境。社會黨、公明黨、民社黨等在野黨於 1979 年 9 月 7 日聯合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大平首相則於當日午後宣布解散眾議院（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9a）。福田、三木、中曾根等反主流派認爲解散的時機尚未成熟，而且大平提出增稅的主張也不利於選舉，因此反對解散。但是大平急於解開「伯仲國會」的困境，強行行使首相的專屬權力「眾議院的解散權」。

10 月 7 日重新選舉結果，自民黨獲得 248 席，不僅不及「安定多數」席次，「伯仲國會」困境也未解，甚至較上屆還要少一席，引發反主流派的抗爭，要求大平應仿照上屆的三木首相引咎辭職，大平則在田中派的強力支持下堅決不退讓。大平首相在面對福田要求應知所進退的逼迫下表示：解決今後重大的政治課題才是我的責任，選舉結果不是辭職的理由，辭不辭職應由黨決定。若我辭職了，誰來當首相？（大平正芳回想錄刊行会，1982：96）。

在大平與福田針鋒相對下，11 月 6 日特別國會進行首相指名選舉時，自民黨出現了分裂的危機。自民黨的首相候選人除了大平派、田中派、新自由俱樂部支持的大平外，還出現了福田派、三木派、中曾根派支持的福田赳夫。在自民黨分裂選舉的狀況下，眾參二院的首相指名選舉都是進入第二輪的決選才由大平勝出。其中，在眾議院第一輪的開票結果顯示，大平僅多福田 10 票，可見雙方陣營對抗的激烈程度（得票情形請參閱表 4）。

自民黨主流與非主流勢力的抗爭，從國會的首相指名選舉延長到政權的黨政人事佈局。大平首相原本企圖透過邀請新自由俱樂部的田川誠一擔任文部大臣，進而與新自由俱樂部組成聯合政權，但是在非主流派的強力反對下受挫，最後暫時由大平首相兼任文部大臣，內閣的組成才於 11 月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終於告一段落。[19] 黨三役的人事方面，則由大平與三木、福田、中曾根等非主流派首領展開數度的協商，大平首相原本擬持續任用自身派閥出身的齋藤邦吉爲幹事長，但受到非主流派的強力反對，因爲違反了「椎名裁定」之際建立的「總幹分離」原則，幹事長若由大平派擔任，則黨政大權都將由大平派獨自掌握，權力過度巨大。在非主流派的強力抵抗下，黨三役的人事直到內閣成立後的 15 日才確定，幹事長是中曾根派的櫻內義雄、總務會長是大平派的鈴木善幸、政務調查會長是福田派的安倍晉太郎（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9b）。根據自民黨幹事長室長奧島貞雄的長年觀察指出，歷屆自民黨政權都是先決定黨三役人事，再協商內閣人事，大平首相的第二任期卻是先完成內閣人事，再確定黨三役人事，是自民黨歷屆政權中首度出現的特異現象（2003：86-91）。從 10 月 7 日眾議院選舉到 11 月 15 日黨三役人事確定爲止，大平派與福田派的抗爭維持了 40 天，故稱爲「四十日抗爭」。

表 4 1979 年衆參兩院首相指名選舉情形

候選人	衆議院		參議院	
	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一輪	第二輪
大平正芳（自民黨）	135	138	78	97
福田赳夫（自民黨）	125	--	38	--
飛鳥雄一郎（社會黨）	107	121	51	52
竹入義勝（公明黨）	58	--	27	--
宮本顯治（共產黨）	41	--	16	--
佐佐木良作（民社黨）	36	--	10	--
其他	9	--	5	--
廢票	--	252	10	88
總投票數	511	511	235	237

資料來源：投票結果根據《第 89 回国会衆議院本会議第 2 号（昭和 54 年 11 月 6 日）》與《第 89 回国会参議院本会議第 2 号（昭和 54 年 11 月 6 日）》會議記錄整理製表而成

備　註：第二輪投票時，自民黨以外的政黨，除了新自由俱樂部外，均投下「白票」（在投票用紙上未書寫支持者的姓名的空白票）成為廢票。

[19] 第二次大平內閣於 1979 年 11 月 9 日成立，成立當時由大平正芳首相兼任文部大臣，直到 11 月 20 日才由谷垣專一擔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西村裁定」

大平首相第二次組閣後，依然面臨著「伯仲國會」的窘境，特別是在野黨在預算委員會掌握了多數席次，大平首相不得不在預算案遭到委員會否決後，才在眾參二院憑藉著多數席次強行通過（奧島貞雄，2006：104）。大平首相在黨內外受到掣肘下，政權運作阻礙難行，在野黨見狀發動攻勢。首先，社會黨與公明黨於 1980 年 1 月對聯合政權構想達成共識，接著社會黨於 5 月 16 日向眾議院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在自民黨非主流派的缺席下，內閣不信任案以 243 票同意，187 票反對的大幅差距下通過（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0a），大平首相遂於同月 19 日宣布解散眾議院重新選舉，6 月 22 日舉行投開票，因正逢參議院每 3 年定期選舉的時程，所以日本政府調整爲眾參二院同日投開票。選舉結果，自民黨獲得大勝，眾議院的席次從選前的 240 席大幅增加爲 284 席，參議院席則從選前的 124 席增加爲 135 席，眾參二院都達到了「安定多數」[20]（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0b）。

然而，在眾參二院競選期間，大平總裁因勞累引發心臟病去世，總裁職位暫由內閣官房長官伊東正義暫代。自民黨各派閥原本期望選後能由資深的副總裁西村英一組閣執政，但不巧的是西村英一落選，自民黨各派閥爲了避免「四十日抗爭」的再現而導致自民黨分裂，因此達成由西村英一裁定繼任總裁的共識。西村英一於 1980 年 7 月 15 日裁定鈴木善幸（大平派）爲新總裁，任期爲大平總裁的剩餘任期。鈴木首相爲人敦厚，同時也以「和的政治」爲執政理念，符合當時自民黨的需求。鈴木總裁的任期於 1980 年 11 月 26 日屆滿後，在無其他競爭者出現下連任。鈴木的第二任期於 1982 年 11 月將屆之際，在鈴木續任的黨內共同氛圍下，總裁選舉告示後一直未有登記者出現。[21] 然而，鈴木總裁卻於登記截止日前四天，意即 10 月 12 日卻忽然表示不再參加總裁選舉，致使自民黨內部出現混亂。

---

[20] 依據《讀賣新聞》的仔細計算，眾議院方面，自民黨獲得 284 席，跨越「安定多數」的 271；參議院方面，假若扣除懲戒委員會外，自民黨的 135 席能夠掌握其餘 15 個常任委員會的主席位子，自民黨在參議院也是達到「安定多數」。

[21] 總裁選舉相關日程的告示如下：1982 年 10 月 16 日候選人登記截止，11 月 23 日黨員黨友投票截止，11 月 24 日初選開票，11 月 25 日國會議員投票決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鈴木總裁忽然表示不再出馬下，行政管理廳長官中曾根康弘（中曾根派）、科學技術廳長官中川一郎（中川集團）、經濟企劃廳長官河本敏夫（三木派），以及通商產業大臣安倍晉太郎（福田派）等四名緊急登記參選，而爲了避免黨的再度混亂，經過黨幹部會議與總務會的決議，新總裁將由黨四役決定，[22] 同時四位候選人也簽署遵守黨四役決定的承諾書，並應允 10 月 23 日前暫停競選活動。然而，事實上，鈴木派、中曾根派、田中派希望透過協商推出中曾根任擔任總裁，而福田派、三木派、中川集團則企圖推出不受田中派制約的人選（奧島貞雄，2003：121）。兩股勢力暗地較勁，導致黨四役協商進入膠著狀態，直到競選活動解禁前一天仍未有結果。時間來到 10 月 23 日，亦即暫停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刻，正當黨四役焦頭爛額之際，國會對策委員長田村元提出「總總分離」的建議，意即中曾根任總理，福田任總裁的建議，黨四役認爲是可行的妥協案。接著，黨四役分別說服了河本、中川、安倍後，最後似乎曾一度說服了中曾根，但是中曾根中途退場打了電話後，便以「總總分離違反民主國家內閣制度的原理」爲由堅決拒絕[23]（奧島貞雄，2006：121），黨四役協商失敗，第二次的「總裁初選」急遽展開。

五、制度的修訂與 1982 年的總裁初選

事實上，「總裁公選規則」於中曾根拒絕黨四役協商前，已經完成二度修訂。「總裁公選規則」修訂時，自民黨的五大派閥「三角大福中」的首領，僅有中曾根未曾擔任過總裁，加上中曾根在 1978 年的第一次總裁初選時有參選的經驗，第二次總裁初選時再度出馬的機率高，因此次二次的修訂值得關注。從結果來看，此二次的修訂有利於小派閥的首領中曾根。（修訂詳細情形請參閱表 2）

第一次的修訂是 1980 年 1 月 23 日兩院議員總會的決議，廢除「點數」與都道府縣的各自推薦制度，改以候選人的全國總裁初選得票數計算，由

[22] 所謂的「黨四役」爲黨三役加上參議院議員會長，當時的黨四役是幹事長櫻內義雄（中曾根派）、總務會長鈴木善幸（大平派）、政務調查會長安倍晉太郎（福田派）、參議院議員會長德永正利（田中派）。

[23] 根據奧島貞雄的推測，應是致電田中角榮，在田中角榮的面授機宜下拒絕。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高票的前二位候選人進入總裁決定選舉。新的規定對小派閥有利，因爲如果在某都道府縣的初選位居第三，依照舊制度則不被推薦，該區的選票就成爲「死票」，而依照新規定則會被採計爲全國的得票中，若小派閥在某些都道府縣具有絕對的優勢，則有反敗爲勝的機會。

第二次的修訂是 1981 年 6 月 4 日兩院議員總會的決議，主要的修改內容有二：一是總裁候選人資格的推薦人數從 30 名增加爲 50 名，二是總裁決定選舉的候選人由初選中排名前二名增加爲前三名。首先，新規定墊高了成爲候選人的門檻，主要的原因是爲了避免造成黨的分裂，儘量透過派閥協商來產生總裁。中曾根派是小派閥，然而在大平內閣的不信任案表決時，原本與福田派、三木派站在同一陣線，但是中途在櫻內幹事長的聯絡下，轉而進入會場投下反對票（中曾根被稱爲牆頭草「風見雞」）；雖然不信任案最終通過，但是中曾根派的行動可望獲得田中派與大平派在總裁選舉中的支持（田中派與大平派均無推出候選人參選）。其次，只要中曾根在初選至少獲得第三名，便會進入由國會議員投票的決選，而只要進入決選，幾乎確定當選。因爲田中派、大平派、中曾根派等三派閥勢力的成員總數，已經遠超過自民黨全部國會議員的半數（自民黨各派閥勢力請參見表 5）。

表 5　1980 年 6 月 22 日衆參同日選舉前後自民黨派閥勢力表

	大平派	田中派	中曾根派	福田派	三木派	中川集團	水田派	無派閥	總勢力
選舉前	70	85	48	75	42	10	5	52	387
選舉後	85	102	53	77	42	12	3	54	428

資料來源：根據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243）的資料整理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二次的修改都是在幹事長櫻內義雄任內完成。櫻內義雄是中曾根派的成員，幹事長的主要任務是執掌政黨的選舉、資金分配等重要黨務，號稱僅次於總裁的第二號人物。實際上，總裁雖然職責爲總理黨務，但身兼首相之故，黨務幾乎全由幹事長統籌。政治是弔詭的，「四十日抗爭」中，福田派與三木派反對大平原先的幹事長人事案，而認爲櫻內義雄人品敦厚，在協商下同意由櫻內義雄擔任幹事長。孰料在櫻內義雄的主導下，修訂的「總裁公選規則」卻有利於福田派與三木派的競爭對手中曾根。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自民黨總裁的第二次初選於 11 月 24 日進行，開票結果，中曾根獲得 559,673 票、河本敏夫獲得 265,078 票、安倍晉太郎獲得 80,443 票、中川一郎獲得 66,041 票。中曾根的得票率高達 57.6%，較其他三者的合計高出甚多。原本依照「總裁選舉規則」的規定，中曾根、河本敏夫、安倍晉太郎等 3 位總裁候選人將進入國會議員投票的決選，河本敏夫、安倍晉太郎、中川一郎也於初選投票前計畫進入決選後，互相合作來與中曾根對決，但是由於初選的得票數差距過大，失去進入決選的正當性，於是河本敏夫與安倍晉太郎雙雙辭退決選，中曾根遂成爲新任總裁。雖然中曾根在第一階段便取得總裁寶座，但是在制度上事前的精心安排與規劃，不難看出派閥競爭暗湧的權謀。

伍、總裁初選制度的挫折

一、裁定的「密室政治」

中曾根總裁於 1984 年 10 月第一任期屆滿，在無人競爭下，兩院議員總會全體一致通過連任，第二任期將於 1986 年 10 月屆滿。雖然根據「黨則」的規定，總裁以二任爲限，但因 1986 年 7 月 6 日的眾參同日選舉中，中曾根總裁率領自民黨獲得大勝，加上尚有日本國有鐵道改革法案（國鐵分割法案）等重大法案尚未通過，因此竹下登幹事長於 9 月 11 日的兩院議員總會提議修改「黨則」，規定在黨籍國會議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時，總裁任期得以延長 1 年，竹下的提案獲得全體一致通過（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6）。中曾根的總裁任期得以延長一年。隨著日本國有鐵道改革法案於 1986 年 11 月 28 日通過後，自民黨便進入了總裁選舉的氛圍。除了幹事長竹下登（田中派）、總務會長安倍晉太郎（福田派），以及大藏大臣宮澤喜一（鈴木派）外，副總裁二階堂進（田中派）也表示將出馬競選總裁。依照「總裁公選規則」的規定，候選人 4 名（含）以上則必須舉行初選，但黨內擔心再度出現類似「四十日抗爭」的分裂狀況，加上田中派的二位後選人都是實力雄厚的政治家，二階堂受到資深政治家的支持，竹下登則受到青壯派的支持，互不相讓，更使擔憂加劇。副總理金丸信（田中派）見狀，便開始策劃「竹下幹事長激勵大會」。激勵大會於 5 月 21 日在東京王子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飯店舉行，田中派 140 名成員中便有多達 118 名出席，政官財界總計約有多達 1 萬 3 千名出席，原定的 2,500 名大廳容納不下，臨時追加第二廳、第三廳，在金完信的操作下，竹下登氣勢難擋，二階堂遂宣布退出總裁選舉（奧島貞雄，2006：140）。

在二階堂退出選舉後，參選人剩下 3 名，依照「總裁公選規則」的規定是竹下、安倍、宮澤三者進入國會議員的決選，但是三者依然擔憂國會議員的決選會造成黨內的紛亂，因此三者決定自行協商產出總裁。但是經過多次的協商仍未有結果，最後委由現任總裁中曾根裁決。中曾根於 1987 年 10 月 20 日做出裁決，竹下登出線成爲總裁。然而，翌（1988）年的 6 月爆發「瑞克魯特事件」與 12 月通過的消費稅法案，使竹下內閣支持持續下挫，根據《朝日新聞》於 1989 年 4 月 29 日公布的民意調查顯示，竹下內閣支持度爲 7%，創下自民黨政權最低紀錄（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a）。竹下登在民意的壓力下辭職，然而安倍晉太郎、宮澤喜一、渡邊美智雄等實力派政治家均涉及「瑞克魯特事件」不便出馬，因此在竹下強勢的主導下，於 1989 年 6 月 2 日「裁定」涉及「瑞克魯特事件」較輕微的中曾根派的宇野宗佑（外務大臣）爲總裁。但是，宇野上任僅三天，日本的週刊誌《星期天每日》（サンデー毎日）便刊出宇野的女性醜聞案，宇野內閣支持度立刻受挫；接著，自民黨在 7 月 2 日東京都議會選舉與 7 月 23 日參議院選舉連續挫敗，宇野最後於 7 月 24 日辭去總裁職務。

宇野辭去總裁職務後，自民黨內部與都道府縣連等基層民意紛紛強烈要求新總裁必須經過選舉產生，拒絕「密室政治」的再來。實際上，竹下登辭職後，自民黨青壯派議員組成的「自由革新聯盟」（跨派閥組織，代表有二位：龜井靜香與白川勝彥）曾對「竹下裁定」進行反抗，主張總裁應由選舉產生，並推出前防衛廳長官山下元利作爲宇野宗佑的對立候選人，但是參選申請書遭到橋本龍太郎的拒收。1989 年 6 月 2 日兩院議員總會選舉新總裁時，自民黨中央擔心青壯派議員採取無法預測的行動，而採用起立的方式進行表決，藉以壓制青壯派的反對力量，最後在青壯派議員的噓聲下，宇野宗佑獲得多數的支持成爲新總裁（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b）。以往兩院議員總會選舉總裁時，因爲事先已經協商完成，在只有一名候選人的情形下，都是全體投票一致通過。1989 年的兩院議員總會是第一次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取起立的方式進行表決的。宇野辭職後，黨內外拒絕「密室政治」與主張透過選舉選出總裁的聲浪更加強烈，特別是竹下與宇野連續二任「裁定」產生的總裁都出現醜聞。而且，「裁定」的「密室政治」與總裁初選制度的設計初衷「開放性選舉」大相逕庭。

二、總裁選舉制度的再建構

自民黨中央在面臨黨內外的強大壓力下，經與各派閥聯繫討論後，決定新總裁由選舉產生。黨內的壓力是指國會議員對現行制度的不滿，因爲連續二次總裁初選的結果，都是未經國會議員投票便決定了新總裁；黨外壓力是指基層民意對於「裁定」的密室政治的不滿。雖然，自民黨中央雖然決定下任總裁由選舉產生，但是卻也面臨到一個難題。亦即，新總裁的任期是宇野總裁的剩餘任期（10 月 30 日屆滿），假若 10 月 30 日舉行總裁公選，考量到告示的發布、黨員黨友名冊的整理、選票的印刷以及投開票等相關細節，在時間上恐準備不及。因此，自民黨中央決定先依照「緊急之際」的「黨則」規定，舉行兩院議員總會選舉新總裁，而新總裁任期屆滿（二年後）後，則透過「總裁公選規則」選舉總裁，此期間則進行「總裁公選規則」的修訂。

(一) 兩院議員總會的選舉機制

依照「黨則」的規定，兩院議員總會是做爲總裁從缺且「緊急之際」的總裁選出機關，但是在「黨則」與「總裁公選規則」中，卻未對總裁候選人的資格、條件，以及選舉方式等重要事項有所規範。因此自民黨中央於 7 月 25 日成立總裁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長：奧野誠亮）處理相關制度問題，在密集的研議下，7 月 31 日決定總裁選舉實施要領，主要的重點有四：一是總裁候選人的推薦人數從 50 名降爲 20 名，藉以消除「派閥政治」的弊端；二是賦予各都道府縣連（各一票）投票權，藉以反應地方的聲音；三是與「總裁公選規則」同樣是單記無記名，藉以降低派閥對國會議員的控制；四是候選人 3 名（含）以上時，第一輪投票結果，若無單獨過半數者，得票數前二高者進入決選；候選人 2 名時，得票較多者勝；候選人只有 1 名時，不舉行信任投票，逕自當選（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c）。8 月 5 日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始接受登記，8 月 8 日舉行兩院議員總會投票。

登記參選的候選人有海部俊樹、石原愼太郎、林義郎等三位。竹下派因涉及「瑞克魯特事件」，因此不推出人選，改爲推出未涉及「瑞克魯特事件」，而且參議院選舉出色的小派閥河本派的海部俊樹。河本派雖然是小派閥，但是在參議院選舉中推出的候選人全部當選（選舉區 4 名、比例區 1 名），是自民黨諸多派閥中的唯一。安倍派則因涉及「瑞克魯特事件」，[24] 而且派閥首領安倍晉太郎因健康因素不出馬，但是與竹下派採取合作的立場。前運輸大臣石原愼太郎在備齊 20 名推薦書後登記參選。石原隸屬安倍派，安倍與竹下採取合作態度，因此積極勸退石原的參選，但被石原拒絕並逕自參選，引發安倍派內部的混亂。二階堂集團則推出林義郎參選，與小派閥海部俊樹競爭。[25] 三位候選人均非派閥領袖，是自民黨創黨以來首見的現象。8 月 8 日選舉結果，海部俊樹在竹下派、安倍派、河本派的支持下，以 279 票大勝林義郎的 120 票與石原愼太郎的 48 票，當選新總裁。

(二) 總裁公選的機制

兩院議員總會選舉總裁後，自民黨中央立即著手因應 1989 年 10 月 31 日海部總裁任期屆滿的「總裁公選規則」的修訂。根據「總裁公選規則」第八條的規定，總裁候選人決定選舉的告示需於黨大會舉行前 30 日發出（自由民主党編，2006：75），而發出告示時（9 月 30 日）必須確定選舉規則，因此，自民黨中央修訂「總裁公選規則」的時間不及 2 個月，是緊急的要務。在幹事長小澤一郎的多方奔走與聽取各方意見與協調後，於 9 月 19 日的「黨基本問題調查會」（會長長谷川峻）與「總裁選舉管理委員會」（委員長奧野誠亮）的共同會議中，提出「總裁公選規則」的修正草案（小澤案），獲得會議修正後認可，並經 26 日的總務會同意後，於 28 日的兩院議員總會獲得通過而正式生效。自民黨中央根據新的規則於 10 月 6 日發布總裁選舉告示，29 日投開票，31 日舉行黨大會（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e）。

---

[24] 福田派的首領福田赳夫於 1986 年 7 月 14 日指定安倍晉太郎爲派閥繼任者，從此「福田派」改稱爲「安倍派」。

[25] 田中派（141 名）於 1987 年 7 月 4 日分裂爲三，一是竹下派（113 名），二是二階堂集團（15 名），三是中立立場（13 名）。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次的修訂有三個重點：一是保證地方黨員與國會議員能夠參與總裁選舉。二是在黨員黨友票的一定比重下，確保國會議員的優越地位，三是決定候選人推薦人數爲 30 名。

首先，關於地方黨員與國會議員均能參與方面。1978 年與 1982 年實施過二次初選，但都在黨員黨友的第一階段初選後，得票第二位以下的候選人辭退決選，導致未經國會議員的決選便決定總裁。總裁身兼首相，作爲政治的最高領導者，在國會議員的支持下推動政局，但總裁卻未經國會議員的選舉便產出，引發國會議員對制度的強烈不滿。另一方面，黨的基層民意是支撐自民黨的重要基礎，「開放性選舉」也是黨近代化改革的基本路線。因此，小澤幹事長爲了兼顧二者，將二階段整合爲一，意即黨員黨友的初選與國會議員的選舉同時舉行（同日投開票），而非前後分別舉行，避免再度發生初選就決定總裁的情形，藉以消除國會議員不滿的聲浪，同時亦能符合地方對「開放性選舉」的要求。

其次，關於國會議員票的優越方面。不論「總裁公選規則」修正前或修正後，國會議員的選票都是維持著一人一票的制度，更改的是黨員黨友的選票計算方式。1977 年的初選是每 1 千票黨員黨友票換算成一點的「點數制度」（都道府縣連各自採計後推薦前二高票者位），1982 年是全國直接統一採計黨員黨友的票數，而 1989 年則改爲「持有票」制度，意即依照都道府縣連的黨員黨友數給予不同的票數，未滿 2 萬名給予 1 票、2 萬名以上 5 萬名未滿給予 2 票、5 萬名以上 10 萬名未滿給予 3 票、10 萬名以上給予 4 票；各都道府縣連獲得最多黨員黨友票的候選人獲得該都道府縣所有的「持有票」（勝者全得）。

原本自民黨總務會通過的「小澤案」是 5 萬名以下 1 票、5 萬名以上 10 萬名以下 2 票、10 萬名以上 3 票。但是，9 月 28 日的自民黨全國幹事長會議（都道府縣連代表組成）提出增加地方票數的強烈要求，例如要求都道府縣連應該一律各給 5 票。小澤幹事長在會後與黨四役協商後決定上述的最終版本。根據《讀賣新聞》的報導指出，若是依照都道府縣連自民黨黨員黨友數來計算，在「小澤案」的計算下，都道府縣連的票數爲 50 票，最終版本則增加爲 74 票。雖然都道府縣連的票數在地方的要求下增加了，但是當時自民黨的國會議員有 403 名（眾議員 295 名、參議員 108 名），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票數還是較國會議員票少（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d）。假設，都道府縣連都積極招募黨員，也都突破 10 萬名，都道府縣連的選票數總計爲 188 票（47 個都道府縣均爲 4 票），依然少於國會議員票，因此修正案賦予國會議員票的優越地位。

最後，關於推薦人數方面。原先的「總裁公選規則」規定總裁候選人的推薦人數是 50 名，1989 年 8 月的兩院議員總會選舉總裁時，以「特例」方式降爲 20 名，但是出現石原愼太郎逕行參選，導致派閥內部出現混亂的情形。小澤幹事長在與黨四役協商下，在確保「開放性選舉」的基層要求，同時又能滿足派閥要求的前提下，將總裁候選人的推薦人數調整爲 30 名。

1989 年 10 月的總裁選舉時，僅有海部俊樹一名登記參選，因此未舉行總裁公選。新修訂的「總裁公選規則」於 1991 年 10 月才正式實際實施，選出宮澤喜一。

三、黨的近代化與派閥

自民黨總裁選舉之所以被視爲萬惡的根源，主要是派閥政治與金錢政治對選舉結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26] 因此總裁初選制度的設計主要的目的便是去除派閥政治與金錢政治。然而，從 1978 年與 1982 年總裁初選實施的過程與結果能夠發現，派閥政治依然健在，爲何派閥政治在自民黨政治中如此頑強？此疑問能從以下二個層面來探討。

(一) 自民黨的屬性

Tsurutani (1980:844-859) 與上神貴佳（2008：222-223）均研究指出，自民黨總裁初選的結果，不僅未能消滅派閥的影響力，反而促使派閥的勢力向地方擴張。爲何會出現如此的現象？

---

[26] 實際上，自民黨總裁選舉中的「派閥政治」與「金錢政治」，從 1956 年的第一屆選舉便已經開始了。當時，在第一輪無候選人獲得過半數票數下，第一輪第一位的岸信介與第二位的石橋湛山進入第二輪的決選，在第二位的石橋湛山與第三位的石井光次郎聯合下，打敗第一輪第一名的岸信介，選舉期間金錢橫流、黨政職位私相授受，甚至出現同一職位事前應允多位議員的怪異現象，第一屆總裁選舉就開啓了金錢政治與派閥政治的弊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自民黨從 1955 年成立以來，一直嘗試著成爲「大眾型政黨」（the mass party）。所謂的大眾型政黨是指，如同西歐一樣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一般，標榜明確的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在黨中央的強力指導下，在全國各地設立分部，大量吸收黨員，透過繳納黨費的義務，換取選出黨幹部的參與權力，亦即以大眾黨員爲基礎的集權式政黨（中北浩爾，2017a：251）。三木也企圖仿效英國的保守黨，擴大國民的支持，積極招募黨員，目標是招募 200 萬名黨員，打破 44 萬名黨員的困境，同時三木也認爲，黨員超過 200 萬名後，黨員的初選會改變總裁選舉的樣貌（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7b）。假若黨員增加，黨費與個人獻金也會增加，能夠避免政治與財界的掛勾（三木武夫出版記念会，1984：273-274）。

但是，建立大眾型政黨的嘗試以失敗告終。因爲自民黨與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不同，自民黨在黨中央與黨員之間存在著高度制度化的，國會議員與地方議員組成的「個人後援會」，個人後援會擁有眾多的會員，而自民黨的黨員絕大部分爲個人後援會的會員。個人後援會的成員及其人脈是國會議員或地方議員選舉時的主要票源基礎。森本哲郎（2017：398-439）也指出，自民黨並非一般教科書所指的「大眾型政黨」，而是以個人後援會爲中心的「後援會聯合的大眾政黨」。

而且，自民黨爲了落實總裁初選，積極擴大黨員的招募，向地方組織提供「獎勵金」的誘因。例如，根據《日本經濟新聞》（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1）的報導指出，1981 年的自民黨黨費是 3,000 日幣，自民黨中央便提供其中的 2,000 日幣做爲都道府縣連與市町村分部的運用資金。各地方組織爲了確保財源，積極地招募黨員，而各地方組織的成員則又隸屬於國會議員或地方議員的個人後援會。自民黨確實擴大了黨員的規模，但與此同時，卻也導致以國會議員爲成員的「派閥」勢力向地方基層擴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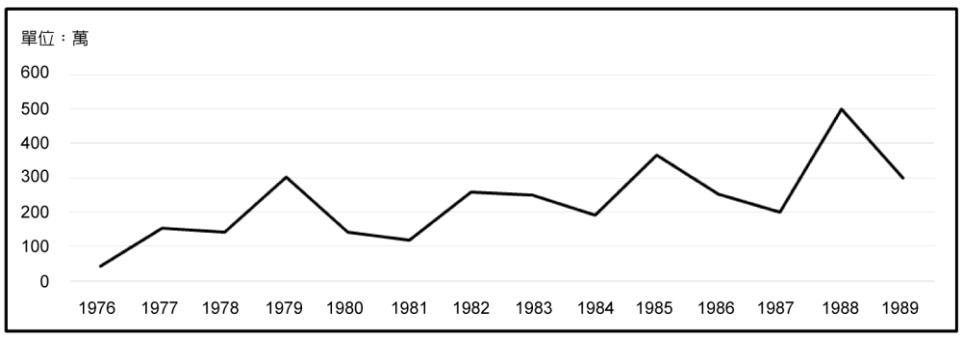
從圖 1 能夠看出，自民黨黨員規模與總裁初選制度成正相關，例如 1976 年的黨員數目僅爲 44 萬名，1977 年總裁初選制度制訂後，黨員規模大福增加 3 倍有餘，約爲 151 萬名，1978 年實施第一次總裁初選時，大致維持著既有的規模；1982 年實施第二次總裁初選時，黨員規模從 117 萬名增加爲 258 名，增加幅度超過 2 倍。

附帶一提的是，根據中北浩爾研究指出，除了總裁初選外，1982 年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員數增加的另一個原因是參議院選舉制度的修訂（2014：119-120）。日本政府於 1982 年 8 月修訂「公職選舉法」，將參議院選舉中的比例代表區從「全國比例區」，改爲以都道府縣行政區做爲比例區，亦即從全國一區改變爲 47 個比例區，而且政黨名單採用「封閉式名單」（Closed list）（拘束名簿式）（野中俊彥，1982：21-26），當選順位依照政黨名單的排序決定。更重要的是，自民黨在政黨名單進行排序時，招募黨員黨友的績效是重要的參考數值。因此，候選人爲了爭取排序優先，積極招募黨員黨友；而且，就候選人而言，將全國區改爲以都道府縣行政單位爲比例區，使得黨員的招募更加有著力點（加藤六月、竹村健一，1982：15-23）。參議院選舉制度的修訂在 1985 年與 1988 年時，也帶來黨員數增加的效果。1985 年的黨員數爲 365 萬，是自民黨成立以來最多，二階堂進副總裁便直言，黨員數大幅增加是將招募黨員黨友數目做爲政黨名單排序的重要參考基準之故（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5），1988 年再度更新紀錄，黨員數高達 500 萬名（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8）。

圖 1　自民黨黨員規模的變化（1976～1989）



資料來源：根據自由民主党編（2006：2589）的資料整理而成

備　　註：自民黨並無公布 1976 年的黨員數，該年度黨員數是根據媒體（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1）的報導採計。

(二) 派閥與政策集團

自民黨派閥曾經達成解散的共識，但是卻又再度躍上政治舞臺，「僞裝解散」的歷史一再重演。例如，三木武夫於 1963 年 10 月在擔任池田總裁的「黨近代化組織調查化會」（党近代化に関する組織調査会）會長之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向池田總裁正式提出「三木報告」（三木答申），報告中呼籲派閥無條件解散、打破派閥人事慣例、政治資金從派閥爲單位改爲政黨中心，並規定個人後援會收受政治資金的上限（竹內桂，2016：28-31）。在三木的呼籲下，自民黨於翌（1964）年初達成共識將派閥解散。然而派閥解散僅爲名義上的作爲，實際上成爲政治勢力競逐的舞臺，在緊接著而來的同年 7 月總裁選舉（池田勇人第三度競選）時，以派閥爲單位的多數派工作再度活躍，派閥解散的共識便煙消雲散。自民黨的派閥數目以「三木報告」爲契機，從八個派閥整合成爲五個，派閥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北岡伸一，1995：113-114）。

在本文的探討時間內，亦復如是。三木武夫於 1974 年 10 月的田中角榮內閣時期，擔任「黨基本問題調查會」會長時，向田中角榮總裁提出報告指出，自民黨體質最大的問題在於派閥，派閥應該要解散，解散派閥的對策有三：一是黨與內閣的人事不受派閥拘束，二是政治資金透明化，三是總裁在國會議員與都道府縣連代表的記名投票下公選產生（田中善一郎，1981：369-372）。但是，三木的報告並未受到以田中總裁爲首的自民黨主流派重視，同年 12 月，三木武夫在「椎名裁定」下接任自民黨總裁後，極力追究田中金脈與「洛克希德案件」的始末，加上媒體及輿論對田中金錢政治的批判，各派閥紛紛解散改以「政策集團」作爲政治活動的據點。根據《朝日新聞》的追蹤報導，在從「金錢與職位」到「政策中心」的社會氛圍中，除了既有的政策集團外，派閥及非派閥主力的政策集團如雨後春筍般地組成（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7c）（請參見表 6）。

1979 年 10 月的眾議院選舉敗選後，出現「四十日抗爭」，在首相指名選舉與黨政人事的對立中，以派閥爲單位的行動又再度出現，而在派閥的激烈對立下，自民黨瀕臨瓦解。自民黨在面臨重大危機下，自民黨的「基本問題運作調查會」（党基本問題運営などに関する調査会，會長根本龍太郎，無派閥）於 1980 年 6 月 26 日提出報告，再次指出自民黨長年以來的弊端主要是派閥的存在，極力主張派閥應該要解散。「根本報告」於同年 7 月 4 日總務會通過後，接著在 15 日的兩院議員總會通過。在此期間，黨內兩大宿敵「福田派」與「大平派」也先後宣布解散（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0c；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0d）。但是，隨著 1980 年 6 月眾參兩院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6　1970 年代後期的政策集團

政策集團名稱	主要政治勢力或負責人	
舊派閥系統	政策研究會	舊三木派
	新總合政策研究會	舊田中派
	政策科學研究所	舊中曾根派
	宏池會*	舊大平派
	清和政策研究會**	舊福田派
既有的政策集團	平河會	宮澤喜一
	新風政治研究會	小坂德三郎
	青嵐會	中川一郎
	21 集團	二階堂進
	千代田會	小坂善太郎
新興政策集團	自由革新同友會	長谷川四郎
	新生俱樂部	藤波孝生
	山中集團	山中貞則
	自由社會研究會	盛田昭夫
	自由政治評議會	長谷川峻
	宗教政治研究會	玉置和郎
	光明未來創造會	武藤亮文

資料來源：根據《朝日新聞》（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7c）製表而成

備　　註：* 宏池會於 1957 年 6 月由池田勇人創立。

**清和政策研究會於 1979 年 1 月 24 日成立。

日選舉的大勝，自民黨的危機感也隨之消散，而且因選後（大平後）新總裁人選究竟誰屬，舊派閥勢力再度出現較勁的現象，本來隱藏在「政策集團」後的派閥勢力再度躍上臺面（足立利昭，1984：190）。有趣的是，在派閥改稱政策集團的時期，大眾傳播媒體會在政策集團後標記「舊某某派」，或是直接稱爲「舊某某派」，所謂的「舊」意指「從前的」之意，因此「舊某某派」應是當下不存在的派閥，新聞記事卻記錄了「當下」「舊某某派」的活動紀錄，印證了福田所指，派閥的解散只是「僞裝解散」。

從上述的情勢發展來看，「政策集團」似乎無法取代派閥的存在。誠如中北浩爾（2017b）所指，派閥的主要功能有四：一是總裁選舉時，候選人的提名與支持，二是國政選舉時，提名候選人及支援，三是政治資金的調度與提供，四是政府、國會、政黨等人事職位的分配。針對政策議題提供建言的「政策集團」屬性與派閥不同，在取代派閥功能的相關制度或慣例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尚未建構完善前，派閥在自民黨的地位恐難被取代。

陸、結論

本文以自民黨總裁初選制度的制訂、實施、挫折爲焦點，說明了 1977 年到 1989 年期間的自民黨政治的變化過程。

一般對政治的觀察，會將焦點集中在政治領導者。日本是採用內閣制度的國家，首相是政治上的最高領導者，掌握著國家機器與龐大的資源，而首相往往由自民黨總裁擔任，因此，自民黨總裁的選舉是觀察日本政治的焦點。以往對於自民黨總裁選出的研究，大致集中在派閥的競爭關係，以及論述總裁初選的政治效果，較少論及總裁初選的制度性因素。

在政治決定過程中，行爲者與制度的影響力孰輕孰重，向爲關注的焦點。從本文討論的案例來看，三木總裁在黨內位居多數勢力的反主流派的反對，不得不放棄行使首相專屬權力的「眾議院解散權」，同時在反主流勢力的「逼宮」下，以「總裁初選」爲條件辭去總裁職位，繼任的福田赳夫在標榜「開放性選舉」下，在「總裁公選規則」中建立了總裁初選制度。從此過程來看，行爲者（三木武夫、福田赳夫）的影響力較大。然而從 1978 年與 1982 年的總裁初選制度的實施過程中來看，在第一階段黨員黨友的「初選」結果出爐後，1978 年第二順位的福田赳夫，以及 1982 年第二順位的河本敏夫與第三順位的安倍晉太郎紛紛辭退進入第二階段的「決選」，出現第一階段便產生新總裁的情形。自民黨引進黨員黨友的「初選」制度，主要是標榜自民黨是重視基層民意的開放性的政黨，因此第一階段「初選」（基層民意）下，第二順位以下的候選人若是選擇進入決選，則有違背總裁選舉制度改革的本意。從此過程來看，制度的影響力是較大的。然而，國會議員對於未能舉行第二階段國會議員投票的「決選」，便產生新總裁出現強烈的不滿，進而促進 1989 年自民黨再度修訂「總裁公選規則」，將「初選」與「決選」合併舉行（同日投開票），不再前後分別舉行，在此過程中，行爲者的影響力又再度超越了制度。從上述的過程來看，就某個時間點而言，或行爲者或制度的影響力較大，但是從較長的時間軸來看，行爲者與制度事實上是動態的互動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60 年代開始，民主國家的政黨紛紛賦予黨員參與選舉政黨領袖的權力。而做爲民主國家的執政黨「自民黨」爲何於 1977 年才制訂黨員參與的總裁初選制度？主要的原因是，自民黨於 1955 年 11 月成立後，自民黨政權一直處於穩定的狀況。例如，對執政黨最具挑戰力量的在野黨社會黨並無獲取政權的企圖心，而是與自民黨透過「國對政治」建構出自民黨的單獨政權。但是，1970 年代中期，自民黨出現金錢政治，以及朝野勢力出現伯仲的情形，導致自民黨政權出現危機。在三木與福田等二位總裁的改革推動下，自民黨於 1977 年才制訂了黨員參與的總裁初選制度。該制度是二階段的總裁選舉制度，亦即第一階段是黨員初選的「總裁候選人資格選舉」，第二階段是國會議員投票的「總裁決定選舉」。

然而，1978 年與 1982 年的總裁初選結果，在第一階段投開票揭曉後，獲得選票第二位（含）以下的參選人辭退進入決選的機會，導致第一階段便決定總裁的人事。在自民黨的總裁身兼首相下，作爲政治的最高領導者的總裁，在國會議員的支持下推動政局，但總裁卻未經國會議員的選舉便決定，引發國會議員的強烈不滿。而且，自民黨在經歷了幾乎導致分裂的 1979 年的「四十日抗爭」事件後，爲了避免再度出現類似的情形，自民黨中央透過「裁定」，或參選人之間透過協商來決定總裁人事。但是，不論是「裁定」或協商，都是「密室政治」，受到基層黨員的強力批判，特別是竹下與宇野連續二任「裁定」產生的總裁都出現醜聞。自民黨在面臨黨內外的強大壓力下，最後在 1989 年重新檢討「總裁公選規則」後，將黨員的初選的國會議員的決選合併舉行，以利同時滿足國會議員與基層黨員的要求。總裁初選制度主要是透過「開放性選舉」，亦即黨員的參與來消除派閥的影響力。但是，從總裁初選的實施過程來看，反而激化了派閥之間的競爭與對立，自民黨中央爲了避免黨的分裂，透過「裁定」的「密室政治」來決定總裁人選，而「密室政治」恰與「開放性選舉」制度的初衷相違背。

爲何自民黨的派閥如此地頑強？本文嘗試著從以下二個層面來探討。首先，關於自民黨的屬性方面。三木總裁雖然企圖將自民黨建構爲「大眾型政黨」，亦即像西歐一般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標榜明確的政治理念與意識形態，在黨中央的強力指導下，在全國各地設立分部，大量吸收黨員，透過繳納黨費的義務，換取選出黨幹部的參與權力。但是，自民黨的屬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卻不同，在黨中央與黨員之間，存在著以國會議員或地方議員爲中心的「個人後援會」。自民黨的屬性並非一般教科書所指的「大眾型政黨」，而是以個人後援會爲中心的「後援會聯合的大眾政黨」。因此，當三木總裁擴大招募黨員的同時，派閥勢力透過國會議員或地方議員滲透到基層，反而致使派閥勢力向全國擴散。而自民黨中央爲了增加黨員規模，提供部分黨費「回流」作爲地方組織招募黨員的「獎勵金」，更是加劇了派閥勢力向全國擴散的反效果，1978 年與 1982 年的總裁初選結果也是派閥勢力強弱的反映。

其次，關於派閥與政策集團方面。誠如三木武夫指出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是萬惡的根源。其實自民黨從 1956 年 4 月的第一次總裁選舉開始，便種下了派閥政治與金錢政治的弊端。雖然自民黨多次提出改革的建議，例如 1964 年的「三木報告」，或 1980 年的「根本報告」都提出爲了斧底抽薪，應該要解散派閥。但是，在總裁選舉的過程中，派閥一再地躍上選舉舞臺，成爲總裁選舉的主要行爲者。例如，1970 年代後期，自民黨的主要派閥曾一度宣布解散，改以「政策集團」現身，但是在總裁選舉的競爭下，隱藏在「政策集團」背後的派閥勢力再度躍上舞臺，「僞裝解散」歷歷在目。派閥政治雖然存在著弊端，但是自有其正面的功能，例如總裁選舉、國政選舉，或是政權組成時的人才提供與支援，或是政治資金的調度與提供，以及新進國會議員的人才養成等重要的功能。在取代派閥正向功能的制度或慣例尚未建構完善前，派閥在自民黨的地位恐難被取代。

總裁初選制度於 1989 年進行了修改，自民黨將黨員初選與國會議員決選合而爲一，亦即將黨員的初選與國會議員的決選合而爲一。1977 年總裁初選制度制訂時，「黨員初選」單獨舉行的政治效應，隨著與國會議員決選的合併而受挫，例如都道府縣連票（黨員票）的比重不如國會議員票，但是卻也開啓黨員參與總裁選舉的契機。1989 年之後，總裁初選制度經過數度的修訂，相對於國會議員票，都道府縣連票（黨員票）的比重逐漸增加，在 2014 年的修訂下，終於與國會議員票的比重相等（票數相同），此期間經過許多的波折。本文礙於篇幅關係，僅討論 1977 年到 1989 年間，總裁初選實施過程中自民黨政治的決定過程，1989 年後的研究課題留待爾後做爲筆者努力的目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書目

一、日文部分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2,〈田中内閣すべり出し好調 支持率、最高の 62% 「政治に不満」も 6 割〉,《朝日新聞》，9/18，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4,〈政党支持率、横ばい 田中内閣、末期は最低の 12%〉,《朝日新聞》，12/8，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6,〈新定数の衆院 安定多数は 271 事務局が算出〉,《読売新聞》，10/20，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7a,〈自民党臨時大会総裁あいさつ：臨時党大会〉,《朝日新聞》，4/25 夕刊，2。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7b,〈前途険しい自民党再生 派閥解消に揺れる：臨時党大会〉,《朝日新聞》，4/26，2。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7c,〈自民新興集団の理論と思惑〉,《朝日新聞》，11/8，2。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8,〈主な党則、規程の改正点：定期党大会〉,《朝日新聞》，1/20 夕刊，2。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9a,〈衆院解散、総選挙へ〉,《日本経済新聞》，9/8，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79b,〈自民、党三役をきょう決定〉,《日本経済新聞》，11/16，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0a,〈自民事実上の分裂 243 対 187 非主流欠席で大差〉,《朝日新聞》，5/17，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0b,〈参院でも安定多数 自民 開票〉,《読売新聞》，6/24，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0c,〈福田派「解散宣言」へ〉,《読売新聞》，7/2 夕刊，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0d,〈大平派も派閥解散を決定〉,《読売新聞》，7/10 夕刊，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1,〈自民党員、100 万人臺回復〉,《日本経済新聞》，11/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5,〈自民立党 30 年 検証と課題（中）派閥・カネ：各派の競合、活力生む〉,《日本経済新聞》，11/14，2。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6,〈「中曽根続投」を正式決定 総裁任期 1 年延長 圧倒的支持理由〉,《朝日新聞》，9/11 夕刊，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8,〈結党以来の最高、自民党員 500 万人に、比例代表で獲得合戦〉,《日本経済新聞》，9/15，2。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a,〈竹下内閣支持率の動き 内閣支持率〉,《朝日新聞》，4/29，4。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b,〈宇野新政権発足へ 自民党両院議員総会で総裁に選出「政治改革を断行」〉,《読売新聞》，6/2 夕刊，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c,〈自民党総裁立候補の届け出は 8 月 5 日 選挙管理委が決定〉,《読売新聞》，7/31 夕刊，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d,〈地方票の増加決定 自民総裁公選規程〉,《読売新聞》，9/28 夕刊，1。

一般情報レポート，1989e,〈総裁選告示 10 月 6 日海部氏 無投票再選へ〉,《日本経済新聞》，9/29，2。

三木武夫出版記念会編，1984,《議会政治とともに：三木武夫演説・発言集（下巻）》，東京：三木武夫出版記念会。

上神貴佳，2008,〈党首選出過程の民主化：自民党と民主党の比較検討〉,《年報政治学》，59(1): 220-240。

大平正芳回想錄刊行会，1982,《大平正芳回想錄〈伝記編〉》，東京：大平正芳回想錄刊行会。

小堺昭三，2008,《自民党総裁選》，東京：ココデ出版。

川上高志，2022,《検証 政治改革 なぜ劣化を招いたのか》，東京：岩波書店。

中北浩爾，2014,《自民党政治の変容》，東京：NHK 出版。

中北浩爾，2017a,《自民党：「一強」の実像》，東京：中央公論社。

中北浩爾，2017b,〈自民党の「派閥」はなぜ求心力を失ったのか：「一強」時代の今、ひもといておきたい歴史〉，東洋経済 web ページ：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170984，2024/3/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北浩爾，2024,〈考える広場 派閥は必要なのか？〉,《東京新聞》，2/14，12。

内山融，2010,〈日本政治のアクターと政策決定パターン〉,《季刊政策・経営研究》，3: 1-18。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編輯，2017,《国政選挙総覧 1947～2016》，東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加藤六月、竹村健一，1982,〈組織拡充にたゆまぬ闘い〉,《月刊自由民主》，321: 15-23。

北岡伸一，1995,《自民党：政権党の 38 年》，東京：読売新聞社。

田中善一郎，1981,〈第六十六代 三木内閣〉，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錄 6》，東京：第一法規出版，頁 355-400。

田中善一郎，1985,〈自由民主党の党首選出手続きルールと派閥権力〉,《年報政治学》，36: 1-33。

田中善一郎，1986,《自民党のドラマツルギー》，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立花隆，1974,〈田中角栄研究：その金脈と人脈〉,《文芸春秋》，52(12): 92-131。

伊藤光利，2006,〈官邸主導型政策決定と自民党〉,《レヴァイアサン》，38: 7-40。

吉田健一，2021,《五五年体制の実像と政治改革以降：元参議院議員・平野貞夫に聞く》，東京：花伝社。

宇治敏彦，2001,《首相列伝广伊藤博文から小泉純一郎まで》，東京：東京書籍。

早坂茂三，1988,《駕籠に乗る人：担ぐ人－自民党裏面史に学ぶ》，東京：祥伝社。

江口伸幸，1985,《派閥再編とニューリーダー：新・合従連衡の時代》，東京：教育社。

竹内桂，2016,〈三木武夫と石橋湛山：石橋内閣期を中心に〉,《自由思想》，141: 22-36。

自由民主党編，2006,《自由民主党 50 年史（CD-ROM 資料篇）》，東京：自由民主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1986，《自民党政権》，東京：中央公論社。

児玉隆也，1974，〈淋しき越山会の女王〉，《文芸春秋》，52(12): 132-152。

足立利昭，1984，《ザ・自民党：長期政権の秘密》，東京：翼書院。

岩見隆夫，1986，〈大平正芳内閣（第六十八代～第六十九代）〉，白鳥令（編）《日本の内閣 III》：東京，新評論，頁 211-236。

河野洋平，1976，〈政治不安こそ望ましい：新自由クラブ代表に聞く〉，《エコノミスト》，54(40): 26-29。

牧原出，2011，〈自民党「長期政権」の形成〉，《レヴァイアサン》，48: 38-64。

信田智人，1994，《総理大臣の権力と指導力：吉田茂から村山富市まで》，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建林正彦，2004，《議員行動の政治經濟学：自民究支配の制度分析》，東京：有斐閣。

堀江湛、城所洋子，1978，〈新自由クラブの躍進と新聞報道：総選挙における新聞報道の内容分析〉，《新聞研究》，319: 65-71。

野中広務，1996，《私は戦う》，東京：文藝春秋。

野中俊彦，1982，〈参議院全国区制の改正：「拘束名簿式比例代表制」の問題点〉，《ジュリスト》，776: 21-26。

奥島貞雄，2003，《自民党幹事長室の 30 年》，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奥島貞雄，2006，《自民党総裁選：権力に憑かれた亡者たち》，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富森叡兒，1994，《戦後保守党史》，東京：社会思想社。

森本哲郎，2017，〈55 年体制崩壊後の自民党の組織問題：理念の展開と実態〉，《関西大学法学論集》，67(2): 398-439。

飯塚繁太郎，1986，〈田中角榮内閣（第六十四代广第六十五代）〉，白鳥令（編）《日本の内閣 III》：東京，新評論，頁 95-128。

塩田潮，2018，《密談の戦後史》，東京：角川書店。

福田赳夫，1995，《回顧九十年》，東京：岩波書店。

藤本一美，2011，《増補「解散」の政治学》，東京：第三文明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西文部分

Brady, D. W., H. Han, & J. C. Pope. 2007. “Primary Elections and Candidate Ideology: Out of Step with the Primary Electorate?”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32(1): 79-105.

Burden, B. C. 2004. “Candidate Positioning in US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2): 211-227.

Cox, G. W. & F. Rosenbluth. 1996. “Factional Competition for the Party Endorsement: The Case of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2): 259-269.

Dalton, R. J., I. McAllister, & M. P. Wattenberg. 2002.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Publics.” 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 Political and Analytical Challenges*, eds. Kurt Richard Luther & Ferdinand Müller-Romm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Farrell, D. M. 2002. “Campaign Modernization and the West European Party.” In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New Europe: Political and Analytical Challenges*, eds. Kurt Richard Luther & Ferdinand Müller-Romm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3-84.

Gerber, E. R. & R. Morton. 1998. “Primary Election Systems and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14(2): 304-324.

Kenig, O. 2009. “Democratization of Party Leadership Selection: Do Wider Selectorates Produce More Competitive Contests?” *Electoral Studies* 28(2): 240-247.

Kittilson, M. C. & S., S. E. Scarrow. 2003.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hetoric and Realities of Democratization.” In *Democracy Transformed? Expand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ed. Bruce E C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9-81.

Krauss, E. S. & R. J. Pekkanen. 2011. *The Rise and Fall of Japan’s LDP: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s as Historic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McElwain, K. M. & M. Umeda. 2011. “Party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Salience of Party Leaders.” *Th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62(1): 173-193.

Reed, Steven R. 1999. “Political Reform in Japan: Combining Scientific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2(2): 177-193.

Sasada, H. 2010. “The Electoral Origin of Japan’s Nationalistic Leadership: Primaries in the LDP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Pull Effect’.” *Journal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ast Asian Studies 10(1): 1-30.

Schattschneider, E. E.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Tsurutani, T. 1980. “The LDP in Transition?: Mass Membership Participation in Party Leadership Selection.” *Asian Survey* 20(8): 844-8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Implementation and Setbacks of the LDP Presidential Primary Elections in Japan: 1977-1989*

*Ming-shan Wu***

Abstract

Generally, observations of politics focus on political leaders. Japan, as a country with a cabinet system, designates the Prime Minister as the highest political leader, who is often concurrently the preside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LDP). Therefore, the LDP presidential election becomes a focal point for observing Japanese politics.

Since the 1960s, political parties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granting their members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ion of party leaders. In 1977, the LDP established a primary election system within its presidential election framework, allowing not only Diet members but also party memb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y did the LDP, as a political party in democratic Japan, only establish a presidential primary system in 1977? And why was it amended after being implemented only twic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election of the party president mainly focused on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action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plain the s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changes in LDP politic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system.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reason behind the LDP's establishment of the primary election system was a significant crisis in their governance due to a financial scandal. In order to regain public support, the LDP aimed to create an image of openness by granting party members the power to elect the party

* DOI:10.6166/TJPS.202412_(102).0003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I-SHOU University.
E-mail: meizyou@isu.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sident. However, due to politicians' personal political interests, the primary elections became a mechanism for factional expansion. This resulted in the system being abandoned after only two implementations and a return to a faction-based electoral system.

Keywords: LDP President, Primary Elections, Diet Members, Faction Politics, Party Politic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